

· 中西文化 ·

首部《葡漢詞典》新探

宋黎明

[提 要] 首部《葡漢詞典》(*Vocabolario Port.Chin.*)現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羅明堅是該詞典的主要作者,利瑪竇與此毫無關聯。另一方面,六名中國合作者,特別是兩名葡萄牙商人的中國通事,在詞典編纂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該詞典原始部分的寫作始於 1580 年,終於 1581 年 6 月 19 日;增添部分的寫作時間則在這一日期之後直至 1590 年代。原始部分寫於廣州與澳門,增添部分除這兩個地點外,寫於肇慶等處以及意大利羅馬和那不勒斯等地。而羅明堅之所以未選擇母語或拉丁文來編纂雙語詞典,與其合作者只懂葡萄牙語而不懂或不通其它西方語言密切相關。

[關鍵詞] 首部《葡漢詞典》 羅明堅及其中國合作者 原始部分與增添部分 編纂時間與地點

[中圖分類號] H773; K207.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1 - 0070 - 09

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葡漢詞典》(*Vocabolario Port.Chin.*, ARSI, *Jap.Sin.*, I 198)在 1934 年公諸於世,並被視為有史以來首部《葡漢詞典》。九十年來,學界對該詞典的興趣有增無減,並且在有關作者和寫作年代等問題上見仁見智。本文依據魏若望(John W. Witek)主編的《葡漢詞典》,在考察其作者及寫作年代的基礎上,闡述對該詞典研究的一己之見,以求教正。

一、首部《葡漢詞典》概述

首部《葡漢詞典》現藏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卷宗號 ARSI, *Jap.Sin.*, I 198,題名為 *Vocabolario Port.Chin.*,內容豐富,葡漢詞典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卷宗題名即由此而來。不過,詞典本身並無標題,《葡漢詞典》之名係約定俗成。該詞典共八十九葉(ff. 32-156),其中有七葉空白(ff. 66v-71v, ff. 85v-86v)。詞典由四欄組成,第一欄為葡文,按照葡文字母順序排列;第二欄為羅馬字注音或拼音;第三欄主要是中文釋義;第四欄為意大利文。由於第四欄意大利文的存在,最早發現該詞典的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將其命名為《歐華詞典》(*Dizionario europeo-cinese*),^①但在後來的著述中,德禮賢復名之以《葡漢詞典》(*Dizionario portoghese-cinese*)。^②學界大都採用《葡漢詞典》之名,因為第四欄意大利文詞條只有寥寥數頁(ff. 32-33v),且顯然係後來增添,故可忽略不計。

《葡漢詞典》無署名,而從筆跡判斷,有多人參與其中。就西文而言,總共有三人的筆跡,其中一人的書寫佔絕大多數,包括第一欄 D 至 Z 的葡文詞條,第二欄幾乎所有的羅馬字注音,第三欄的

少量葡文,如 non de tudo amarelo (f. 41)、de mandarino (f. 81)、engenhoso (f. 91)等,以及第四欄所有的意大利文詞條。第一欄 A 至 C 的葡文詞條是另外一個人的筆跡,另有第三人書寫的 sunue 和 Tiansiusunwanue (f. 63)。^③至於中文書寫,筆者辨認出七種筆跡,其中一種外國人的筆跡,六種中國人的筆跡。甄別這些作者,尤其是次要的作者,殊非易事。

無論如何,《葡漢詞典》提供了一個寫作日期:最後一頁(f. 156)寫有兩行拉丁文: *Laus Deo Virginiq Matri, Divis Gervasio et Protasio. Amen. Jesus* (讚美天主與童貞聖母,聖蓋法削和玻羅大削節日,阿門,耶穌)。聖蓋法削和玻羅大削是意大利米蘭城的兄弟,公元二世紀著名的天主教殉道者,他們的節日是 6 月 19 日。用聖人節日代指某日是天主教國家的習慣,在傳教士寫作中屢見不鮮,例如,羅明堅在 1590 年代中期的一份中國傳教報告書中寫道,他在 1572 年的聖西滿及聖猶達宗徒(vigilia delli santi Apostoli Simone et Giuda)紀念日前夕,亦即 1572 年 10 月 27 日到達羅馬。^④因此,6 月 19 日一般被認為是《葡漢詞典》完成的日期。^⑤然而,羅明堅僅寫月日而未寫年份,《葡漢詞典》的寫作年份依然成謎。鑒於第三欄中文部分有多種筆跡,說明《葡漢詞典》有一個較為漫長的添加和補充過程,6 月 19 日所指究竟是詞典最後完成的某一年,還是完成過程中的某一年,這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

據統計,詞典上葡文條目有 6,000 多條,而中文條目則有 5,460 多條;葡文條目多於中文條目的原因,在於許多葡萄牙文詞條沒有相應的中文譯名及其注音,這種現象在 A 至 C 部分尤為明顯,其中一頁上葡文詞條有 35 條,而中文詞條只有 18 條(f. 37)。在 A 至 C 部分,還有 90 個中文詞條沒有注音,而且經常在第二欄相應的注音處打上加號。另一方面,《葡漢詞典》最後兩個詞條 Zurrar d'asna, lu chiau; zinir a orelha, gi to scian(f. 156),^⑥有羅馬字注音而無對應的中文,實屬罕見。值得注意的是,一個葡語詞條往往有多個中文譯名,但並非所有中文詞條都有相應的注音。以 f. 99 的三組詞彙為例: Falla mandarin, cuan cua-cin yin, 官話—正音; fallador, falla muyto, to zuj, 多嘴, 饒舌; fallador, falla bem, quei chian, 會講, 能言, 會語, 高談(f. 99v)。顯而易見,凡帶有注音的漢字,如“官話”、“正音”、“多嘴”和“會講”是一種筆跡,而其它不帶注音的漢字則是另一種筆跡,說明前者屬於詞典的原始部分或主體部分,而後者則為添加部分或補充部分。縱觀詞典,屬於詞典原始部分的漢字也有兩種筆跡,即 ff. 32-66、ff. 141-156 為一種筆跡,ff. 72-140v 為另一種筆跡。有鑑於此,第二欄的注音以及第三欄與注音相關的漢字,連同第一欄的葡文,屬於《葡漢詞典》的原始部分,其餘的則係後來補充,屬於詞典的添加部分。由於詞典末頁所署日期緊接最後一個單詞,而且整頁除了與原始部分相同的筆跡以及幾個外國人書寫的漢字,不見其他中國人添加的中文詞彙,故可判斷 6 月 19 日當指《葡漢詞典》原始部分完成的日期。

二、傳統解釋及其挑戰

九十年前,德禮賢發現《葡漢詞典》後,在其首頁內頁上標注如下:“這是一部歐華詞典,作者為羅明堅和利瑪竇。它是同類詞典的第一部,意大利文所做的羅馬字拼音,可能是利瑪竇所寫,其中也經常有羅明堅的書寫。……它應該是 1583 年至 1588 年所作。”^⑦在德禮賢看來,《葡漢詞典》兼有利瑪竇和羅明堅的筆跡,故兩人為共同作者;至於該詞典撰寫的年代,他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但 1583 年羅明堅和利瑪竇定居肇慶,1588 年羅明堅離開中國返回歐洲,德禮賢的根據或許正在於此。在四年之後撰寫的有關專文及《利瑪竇資料》中,德禮賢重申了這一觀點。^⑧時隔半個世紀,楊福綿從歷史學和語言學的角度對《葡漢詞典》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在詞典的寫作年代問題上,他毫無

保留地採納了德禮賢的 1583 年至 1588 年之說；但在作者問題上，他卻走了一段彎路：1986 年在台北舉行的國際漢學會議上，楊福綿將這部詞典歸為利瑪竇的個人作品，羅明堅被排除在外；^⑨而在後來改寫的論文中，他轉而贊同德禮賢的看法，認為葡漢詞典係羅明堅與利瑪竇合作的成果。^⑩2001 年魏若望主編《葡漢詞典》時，影印了全部詞典，並收錄了楊福綿的論文。魏若望在為該書所寫的導言中，充分肯定了德禮賢的看法，即《葡漢詞典》是由羅明堅和利瑪竇共同完成的，寫作時間為 1583 年至 1588 年。

對於這一傳統觀點，最大的挑戰來自巴雷托（Luís Filipe Barreto），他在 1997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兩點質疑：其一，進入中國之初，羅明堅和利瑪竇的葡語並不流利，更不用說他們的中文了，他們何以能夠做出這樣一部較大規模的葡漢詞典？其二，為什麼這部詞典包含的航海與商貿術語較多，而學術、神學或宗教用語較詞彙少？^⑪魏若望辯解說，利瑪竇在里斯本和澳門學習了葡萄牙文，而羅明堅在里斯本和印度也十分活躍，他們的葡語比巴雷托所說的要嫻熟得多。此外，為了說服葡萄牙商人尊重中國習俗，羅明堅需要找到一些航海與商貿詞彙，而且詞典中也不乏神學詞彙，“最有意義的詞彙之一是定義為‘天主生萬物’的 Creador”。^⑫但巴雷托並未被說服，他在隨後的文章中進一步指出，《葡漢詞典》是一個集體的產物，“由幾個中國人和葡萄牙人撰寫，並由羅明堅和利瑪竇協調”。關於詞典的編寫年代，他認為大部分寫於 1580 年至 1588 年間，寫作地點則為澳門和肇慶。^⑬

遺憾的是，巴雷托似不懂漢語，故難免誤判。僅以航海用詞而言，他列舉了若干例子，據此證明《葡漢詞典》中的航海詞彙高深淵博，但實際上它們的中文翻譯錯誤百出，而且經常錯得離譜，故適得其反：arriba 本義為“海邊峭壁”，中譯“嘔吐（ohiu tu）”（f. 45v）；arribar 本義為“抵達港口、順風飄行”，中譯“上頭（scian teu）”（f. 45v）；Baldear 本義為“用水沖洗甲板”，中譯先為“馬齒苳（ma ci jan？）”，後加寫“馬齒莧”（f. 50）；bora 本義為“寒冷乾燥的北風”，中譯“舡邊（ciun pien）”（f. 53）；同葉 botar fora 本義為“船下水”，中譯“打鈍（ta tun）”；cabrestante 本義為“起錨的絞盤”，中譯“小羊（Siau jam）”（f. 55）；同葉 cabresto 本義為“船頭斜桅支索，牛群的領頭牛”，中譯“看羊的（can jan ti）”（f. 55）。此外，catre da Índia（f. 58，船上吊床）、esporão da não（f. 97，花距、船首沖角）均缺中譯及注音。在巴雷托列舉的所有例子中，只有一個葡語單詞有正確的翻譯，即 baixa-mar（f. 50），原意為“低潮，退潮”，中譯為“潮退（ciau tui）”。由此可見，《葡漢詞典》的編纂者缺少基本的航海知識，與所謂的航海家風馬牛不相及。《葡漢詞典》中與商業、政治、外交等相關的詞彙也大抵如此。因此，它不過是一部普通簡單的日常生活詞典而已。

無論如何，如果《葡漢詞典》的編寫時間為 1583 年至 1588 年間，那麼正如巴雷托所強調的那樣，1584 年出版的《天主實錄》中的宗教詞彙就應該出現在該中。另外，對於意大利人為何編寫葡漢詞典，學界似乎也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毫無疑問，巴雷托的挑戰極大地推動了《葡漢詞典》的研究進程，其中以王慧宇的研究最為突出：通過比較《葡漢詞典》與收藏在羅馬國家圖書館的拉丁文《四書》的筆跡以及如 lume naturale（明德）等詞彙，王慧宇確認羅明堅為《葡漢詞典》的作者，從而排除了利瑪竇；另外，通過比較《葡漢詞典》與《天主實錄》中的相關宗教詞彙，她更推斷該詞典“大概完成於 1579 年至 1584 年間”，^⑭從而顛覆了 1583 年至 1588 年的傳統說法。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擬進一步探討《葡漢詞典》的作者、編寫年代、地點及其它相關問題。

三、詞典作者：羅明堅及其合作者

為了尋找《葡漢詞典》的作者，學者們嘗試辨認詞典中的筆跡。德禮賢指出，詞典第一欄葡文

的書寫者是某個抄手,第二欄拼音的書寫者是利瑪竇,第三欄漢字的書寫者是利瑪竇或羅明堅,第四欄意大利文的書寫者是羅明堅。^⑤包志仁(Fernando Bortone)大致贊同德禮賢的看法,但認為第三欄漢字的書寫者是一個中國文人,並且有歐洲人的補充筆跡。^⑥楊福綿認為,第一欄的葡文出自歐洲人之手,或者是利瑪竇,或者是羅明堅;第二欄的寫手是羅明堅;第三欄的寫手是一個中國人,其中“偶爾有外國人添加的字”;第四欄的寫手是利瑪竇。^⑦Levi認為第一欄的葡文出自歐洲人之手,書寫者有時是羅明堅或/和利瑪竇,第二欄“幾乎肯定為利瑪竇書寫”,第三欄則列舉德禮賢和楊福綿的兩種看法而不加分辨,但補充說不時出現另外一人的字跡;第四欄寫手則為羅明堅。^⑧魏若望的觀點是,第一欄的葡文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寫法,從字母A到C出自某位不知名的抄手,而從D到Z無疑出自羅明堅之手;第二欄的寫手為羅明堅;第三欄的漢字多數出自一個中國之手,但參雜著一些不好看的漢字,有可能為利瑪竇或羅明堅所寫;第四欄的意文既不是羅明堅的手跡,也不是利瑪竇的手跡。^⑨

對於上述紛紜眾說,筆者在此做一評判。總而言之,《葡漢詞典》的葡文、羅馬字注音以及意大利文大都出自羅明堅之手。具體而言,第一欄的葡文字母D到Z的書寫者為羅明堅,而字母A到C書則是另外一個人的筆跡,作者不詳。第二欄的羅馬字注音絕大部分是羅明堅的筆跡,第三欄的少數葡文以及第四欄的意文也是羅明堅所寫。不僅如此,第三欄外國人書寫的漢字,也當是羅明堅所為;羅明堅在《通俗故事》上署名“魯子秀”,並在雙語《千字文》中寫有“姓”、“名信”三個漢字,^⑩它們與《葡漢詞典》中外國人所寫的漢字高度相似。筆者辨認出羅明堅所寫的中文單字或詞組大約有一百個左右,其中個別漢字與相關的葡文寫在第一欄前面,如 *lume naturale*,明德(f. 113v), *Padre*, 僧、野僧(f. 126v)等。此外,第三欄中還有十多處大寫字母P後面書寫的漢字,如P. 黃半未勻(f. 41), P. 敲斷玉釵、十扣柴扉(f. 51), P. 天街(f. 56)等,均出自羅明堅之手。姚小平將P. 解釋為拉丁文 *post scriptum* (又及)的縮略,^⑪似誤,因為 *post scriptum* 的縮略是 *P. S.*,而P. 當為拉丁文 *Pater*、葡萄牙文 *Pai*、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Padre* 的縮略,意為“神父”,此處實為羅明堅本人的“夫子自道”。顯而易見,羅明堅在《葡漢詞典》中舉足輕重,而利瑪竇則與它毫不沾邊。

詞典第三欄中有六種中國人的筆跡,他們均為羅明堅主編的《葡漢詞典》的合作者。其中,詞典原始部分的兩位合作者最為重要,因為相關葡文的漢譯及注音取決於他們。羅明堅學習漢語的第一個老師是一位中國畫師,但此人基本不懂葡文,他通過繪畫的方式教授漢語,^⑫故當無涉《葡漢詞典》。1580年春以及次年春,羅明堅兩度隨同葡萄牙商人進入廣州,隨行的有懂葡語的中國通事,他們自然成為羅明堅新的漢語老師;後文將論證,《葡漢詞典》的原始部分完成於1581年6月19日,所以這些通事也成為詞典的合作者;鑒於原始部分存在兩種筆跡,故可判斷有兩位通事參與其中。遺憾的是,我們對於這兩位通事的姓名、年齡和籍貫等信息一無所知。

至於在詞典增添部分上書寫漢字的其餘四名合作者,其中兩人有跡可循。其一, *Phelipe Méndez* 是羅明堅在華早期(1581年至1583年5月間)最重要的合作者,他與羅明堅共同撰寫了《通俗故事》和雙語《千字文》等著作,而《葡漢詞典》的一些漢字如“師傅”(f. 119)、“教門”(f. 143v)等,與《通俗故事》中的“師傅”和“教門”等筆跡基本契合;^⑬他在《葡漢詞典》上書寫了大約二百個單字或詞組,包括著名的“天主教生萬物”及其羅馬字注音。^⑭其二,羅明堅最後的漢語老師是一位異教徒,姓名不詳,1587年初由羅明堅聘用,後來“與他一同離開中國(*menò seco della Cina*)”^⑮,很可能客死意大利;他是《尺牘指南》^⑯釋文部分的作者,也是羅明堅《中國詩歌集》以及《詩韻》^⑰的抄錄者;他在《葡漢詞典》上書寫了大約三百個單字或詞組,其書寫時間或在1590年代。

四、詞典的寫作時間及地點

如果辨識《葡漢詞典》的作者需要從辨認字跡著手,那麼考證其寫作時間則可以從詞典的中文詞彙切入。如前所述,詞典末尾寫有“聖蓋法削和玻羅大削節日”,即6月19日,這應該是詞典原始部分完成的日期,而需要確定的是哪一年的6月19日。詞典中的一些詞彙,為確定其原始部分的完成時間提供了重要線索。

首先來看一下學界關注的“天主”一詞。《葡漢詞典》有兩個與此相關的詞條,一是 *Por merce de Deus, in guei deus*, 因為廖師(f. 132; 按:廖師兩字原有口字旁), 二是 *Criador, Tiansiusunwanue*, 天主生萬物(f. 63)。從筆跡以及其它跡象看,前者屬於詞典原始部分,後者屬於添加部分。換言之,在寫作詞典原始部分時,編纂者尚不知用“天主”表示 *Deus*。那麼,“天主”一詞最早出現於何時? 根據利瑪竇1583年9月13日致羅曼(*Giambattista Roman*)函,《天父經》、《聖母經》和《祖傳天主十誡》此前即已刊印。^②也就是說,在1583年9月13日之前,羅明堅等人已知 *Deus* 的中譯“天主”。據此,《葡漢詞典》原始部分完成的時間當為1583年6月19日。^③然而,根據筆者最近的發現,大約撰寫於1582年和1583年之交的《通俗故事》中,九次出現“天主”一詞。^④據此,可以推斷《葡漢詞典》原始部分當完成於1582年6月19日。

然而,通過考察“師傅”一詞,《葡漢詞典》原始部分完成的時間還可提前。在詞典中, *Mestre* (f. 119) 一詞後有注音 *sien sen*, 後有兩個中文詞條“先生”和“師傅”,前者對應拼音 *sien sen*, 後者則沒有拼音,兩者筆跡不同,“師傅”顯然為後來添加,這意味著羅明堅及其中國合作者在撰寫詞典原始部分時,尚不知“師傅”而只知“先生”。有跡象表明,到1581年11月12日,羅明堅已經確知“師傅”一詞:在是日致總會長梅庫利阿諾(*Everardo Mercuriano*)函中,羅明堅寫道:“與此同時,因為我稍能閱讀,他們叫我 *sifu* (師傅), 中文意思是大師(*gran mestre*)。”“我每次在廣州時打交道的朝廷命官,現在叫我 *sifu* (師傅), 即大師(*gran mestre*)……。”^⑤一封信中兩次提到“*sifu* (師傅)”一詞,可見羅明堅對其印象之深。有鑑於此,《葡漢詞典》的原始部分完成於1581年11月12日之前,準確而言完成於1581年6月19日。

從1579年7月抵達澳門並開始學習中文,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內,羅明堅果真能夠在中國通事的協助下完成《葡漢詞典》的原始部分嗎? 答案是肯定的。羅明堅學習外語的能力出類拔萃,在印度期間,他在幾個月內就學會了當地方言,並用之於傳教。^⑥同樣,羅明堅在漢語學習方面也突飛猛進,澳門耶穌會院戈梅茲(*Pedro Gomez*)院長1581年10月25日在一封書信中寫道,羅明堅親口說已經認識一萬二千個漢字。^⑦同年11月12日,羅明堅致函總會長梅庫利阿諾,聲稱認識一萬五千個漢字,而且隨函寄上他最近在廣州期間用拉丁文翻譯並注音的蒙童讀物《千字文》。^⑧羅明堅所說的漢字數量或有誇張,但如果沒有一部《葡漢詞典》在手,他也許沒有如此誇口的底氣。特別重要的是,《千字文》是一部具有相當難度的讀物,既然羅明堅在1581年下半年已經有能力將它譯為拉丁文,此後絕無必要再製作一部日常用語的《葡漢詞典》。

關於《葡漢詞典》編撰的起始時間,巴托利提出1580年之說,王慧宇則認為始於1579年,即從羅明堅在澳門開始學習漢語算起。巴雷托之說似乎更為合理,如前所述,羅明堅最初的漢語老師是一位不懂任何外語的中國畫師,而編撰葡漢詞典則需要一位懂葡語的中國通事。大約在1580年4月首次隨葡萄牙人去廣州前後,羅明堅才有機會接觸中國通事,並開始撰寫《葡漢詞典》。詞典的原始部分完成於1581年6月19日,亦即他第二次在廣州期間。因此,《葡漢詞典》的原始部分當始

於 1580 年春,編寫地點為澳門和廣州。至於增添部分,則寫於 1581 年 6 月 19 日之後,合作者當為羅明堅的其他中文老師,編寫地點在澳門和廣州之外,主要在肇慶,可能也包括浙江和湖廣等地。

羅明堅於 1588 年底離開肇慶返回歐洲,為此不少學者將 1588 年作為詞典編寫的終止時間。如果排除第四欄的意大利文,這一說法似可成立;然而,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羅明堅為何要在一部葡漢詞典上增加意大利文,又為何僅僅寫了兩葉多便草草收場?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意文不是羅明堅為自己而寫,因為他既懂葡語又懂漢語;這也不是他為同會而寫,因為同為意大利人的利瑪竇的葡文水平或高於羅明堅,而對於孟三德或麥安東等葡萄牙傳教士來說,更似畫蛇添足。在一部葡漢詞典上增添意文,其對象只能是普通意大利人,這意味著羅明堅打算將葡漢雙語詞典擴大為葡漢意三語詞典,或者改編為漢意雙語詞典。這些意文被認為是用歐洲墨水書寫的,^⑤可為旁證。羅明堅回國後有一個宏大的寫作和出版計劃,如拉丁文版的《天主實錄》、《四書》和《中國圖志》等,一部雙語或三語詞典或許也是其計劃的一部分。然而,由於上司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阻攔,羅明堅的出版計劃幾乎全部流產,意文詞條的寫作就此中斷。因此,第四欄意大利文以及一些中文補充條目的寫作時間當在 1590 年代,寫作地點當在羅馬和那不勒斯。

五、有關《葡漢詞典》的其它問題

釐清了《葡漢詞典》的作者和寫作年代之後,便不難解答巴雷托提出的疑問了,即為什麼一名意大利人編纂的最早的雙語詞典是一部葡漢詞典?對羅明堅而言,他編寫雙語詞典的首選文字應該是他的母語意大利語或拉丁文。但由於合作者只懂葡萄牙語,而不懂或不通其它西方語言,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葡語取代其母語。但是,以往研究者忽視的另一個問題是:羅明堅與只懂葡語的中國人合作的成果,可以是一部葡漢詞典,也可以是一部漢葡詞典;從學習漢語的目的出發,羅明堅急需的不是葡漢詞典,而是漢葡詞典,以便隨時查閱漢語生字。首部《葡漢詞典》的真正用途,僅僅是為了讓羅明堅在短時間內迅速掌握較多的漢語詞彙,主要是日常用語。羅明堅之所以沒有首先編寫一部漢葡詞典,可能是因為要編這樣一部詞典,首先需要一本簡明漢語詞典作為底本,而明末中國缺少這種詞典,中國合作者也沒有能力或時間為羅明堅編寫這樣的詞典,所以羅明堅只能先寫葡文,再由中國合作者寫漢字並讀其音,最後由羅明堅用羅馬字注音,一部葡漢詞典遂橫空出世。

關於《葡漢詞典》所依據的西文詞典,以往研究者傾向於相信它是某種葡語拉丁語雙語詞典,如卡爾多索(Jeronimo Cardoso)於 1569 年出版的《葡拉詞典》。^⑥這一假設存在兩個缺陷。首先,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均屬拉丁語系,對於精通拉丁文的意大利人而言,學習葡語並不困難;事實上,早在 1579 年,羅明堅就曾用葡語給上司寫過書信,^⑦而他到澳門後的同會多為葡萄牙傳教士,而一同參加廣州交易會的中國通事也操葡語,故使用葡語的機會甚多,何況《葡漢詞典》的葡語詞彙相當簡單,一部葡拉詞典對於羅明堅而言可有可無。其次,編纂《葡漢詞典》的關鍵不在於羅明堅的葡文水平,而在於中國通事能否將其翻譯為中文;這是《葡漢詞典》中尤其是 A 到 C 詞條中許多葡語詞彙缺少中譯及注音的原因。通事們想必不懂、至少不通拉丁文,為了協助羅明堅編寫《葡漢詞典》,他們無需借助葡拉詞典之類的西文雙語詞典,一部普通的葡語詞典足矣!

進而言之,《葡漢詞典》在依據某種葡語詞典的同時,可能也參考了中國通事的個人筆記。《葡漢詞典》按照葡文字母從 A 到 Z 排列,每個單元也按字母順序排列,但時有混亂,以 C 單元最甚。例如,在 *cuteleiro* 之後,折回 *Clara* (f. 63v),繼而在 *cruxado* 之後,折回 *cafar* (f. 64),然後在 *curar* 之後,又折回 *chauva* (f. 65v);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簡單地根據一部葡語詞典,應該不會出現這

種情況；這意味著在葡語詞典之外，《葡漢詞典》在編寫過程中可能還參考了中國通事的學習筆記。中國通事開始學習葡語時，沒有現成的葡漢詞典可資使用，故需要將所學的葡語記錄下來並譯為中文，以備複習。據此，每個通事都可能有一個自製自用的詞彙筆記或葡漢小詞典，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葡漢詞典》的基礎。

利瑪竇曾批評當時中國通事的葡語和中文水平均差強人意，^③信非虛言，《葡漢詞典》中許多葡語詞彙未譯或錯譯的原因正在於此。中國通事的葡語和漢語水平決定了《葡漢詞典》的水平，他們的發音也直接影響了其羅馬字注音。毫無疑問，羅明堅等在華傳教士所學是《葡漢詞典》所謂的“官話”或“正音”（f. 99v），中國通事使用的也是官話，所以詞典的注音應為官話。《葡漢詞典》中的羅馬字注音與當時的官話可能存在差異，原因之一是羅明堅的注音相當隨意，一個音往往有多種寫法，如現代漢語的 h 發音在詞典中就有三種寫法：h，如“好”音 hau（f. 116）、“海”音 hai（f. 117）；c，如“花”音 cua（f. 102v）、“貨”音 cuo（f. 105）；g，如“糊”音 gu（f. 107v）、“黃”音 guan（f. 143）。原因之二是中國通事的官話未必標準，可能帶有地方口音，這可能會在《葡漢詞典》上留下印記，而通過這些注音，或有助於確定兩名通事的籍貫。當時有嶺南通事之說，表明葡萄牙商人雇傭的通事多為廣東籍，因此，如果詞典的注音帶有粵語或客家話的痕跡，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如果像一些研究者所發現的那樣，這些注音帶有閩南口音，那麼這兩名通事或其中一名有可能來自福建。^④

羅明堅的書信以及同時代人的通訊無一提及《葡漢詞典》，原因在於這是羅明堅的自用本。在 1581 年 6 月 19 日與中國通事合作完成了詞典的原始部分後，羅明堅的其他合作者得以目睹手稿並在詞典上添加新詞，時間跨度從 1581 年下半年到 1588 年羅明堅返回歐洲之時甚至之後。比之兩位中國通事，這些作者的漢語水平更高，漢字也寫得更好，但他們添加的中文詞彙通常不帶羅馬字注音，故對《葡漢詞典》的注音沒有影響。與此同時，羅明堅本人也不時在詞典上增補，返回意大利後甚至添加了第四欄意大利文的相關詞條。羅明堅逝世後，其手稿統統歸藏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包括“十三本中文手寫的書籍”，^⑤《葡漢詞典》當為其中之一。

六、結語

綜上所述，《葡漢詞典》的作者是羅明堅及其中國合作者。詞典原始部分的寫作大概始於 1580 年春，終於 1581 年 6 月 19 日；增添部分則從 1581 年下半年至 1590 年代。詞典的原始部分完成於利瑪竇到達澳門之前，他無從染指；但從 1582 年利瑪竇抵達澳門直至羅明堅 1588 年離開肇慶的六年間，詞典幾經增補，但始終未見利瑪竇的蹤影，這似乎需要一個解釋。筆者認為，作為耶穌會學習漢語第一人，羅明堅學習之路非同尋常，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1579 年 7 月到達澳門後，他師從一位基本不懂外語的中國畫師，學習的方法是看圖識字；第二，大約從 1580 年到 1581 年 6 月 19 日，他依靠兩位在澳門的中國通事製作了葡漢詞典的原始部分，以便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較多的中文日常用詞；第三，1581 年秋，羅明堅用拉丁文注音並翻譯了《千字文》，猶如一部漢拉小詞典，標誌著他終於走上了學習漢語的正途。利瑪竇的情況則不同，有羅明堅為師，他不必再繞彎路，無需使用《葡漢詞典》之類的語言工具，而可以直接採用雙語《千字文》之類的教材，如同後來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o）所做的那樣。^⑥學界一度相信，利瑪竇是《葡漢詞典》的作者之一，甚至唯一的作者，利瑪竇的歷史地位之被過分高估，由此可窺一斑。

另一方面，在早期中國天主教歷史的研究中，包括教徒在內的中國人的作用則遭到普遍忽視。以往的研究者並非沒有注意到中國人在詞典上留下的痕跡，唯獨巴雷托鄭重其事地考慮過他們的

角色。毫無疑問,正是因為中國通事只懂葡語而不懂其它外語,所以這部詞典不是意漢詞典或拉漢詞典,而是葡漢詞典。在1581年6月19日之前,如果沒有羅明堅,中國通事也完全可以製作出一部類似的葡漢詞典,儘管這樣的詞典不會有羅馬字注音;而如果沒有中國通事,羅明堅當時絕無可能製作這樣一部葡漢詞典。筆者甚至假設,在羅明堅主編《葡漢詞典》之先,最早為葡萄牙商人服務的中國通事,在學習葡語的過程中會做一些筆記,相當於葡漢詞典的雛形。無論如何,在編寫《葡漢詞典》原始部分時,中國通事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當然,為了簡單起見,我們不妨將《葡漢詞典》掛在羅明堅名下,因為這部字典是他主持編撰並保存下來的,他是該詞典最重要的作者,尤其是他在詞典第二欄標出了羅馬字注音。從嚴格意義上講,用母語對某種外語進行注音自古即有,而用羅馬字為漢語注音,在大航海時代更趨流行;這類注音通常只限於人名、地名、官銜等漢語名詞,而羅明堅首次將羅馬字注音用於他所接觸到的所有漢語詞彙,以便隨時隨地地複習這些詞彙,不但會看會寫,而且能聽能說。羅明堅主編的《葡漢詞典》雖然從未出版,但其注音系統透過利瑪竇等傳教士及其他人得以傳播,並在經過改造之後形成了各種拼音系統,直至現代漢語拼音。羅馬字注音是羅明堅對《葡漢詞典》乃至漢語學習的獨特貢獻,這種包羅萬象的注音方法,不但惠及在華外國傳教士和所有學習漢語的外國人,而且惠及母語為漢語並使用漢語拼音的中國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羅明堅及其《葡漢詞典》堪稱漢語拼音的鼻祖。

① ARSI, *Jap.Sin.* I 198, f. 1. Pasquale M. D'Elia, "Il primo dizionario europeo-cinese e la fonetizzazione italiana del cinese", in *Atti del XI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gli orientalisti*, Roma 1938, pp. 172-178.

②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Elia,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II, p. 32, n. 1.

③ 與這兩組注音對應的中文是“生物”和“天主生萬物”。王銘宇最早注意到這兩組注音與眾不同,見王銘宇:《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詞彙問題舉隅》,北京:《勵耘語言學刊》,2014年第1期。

④ Michele Ruggieri, *Relatione del successo della missione della Cina del mese di Novembre 1577 sino all'anno 1591 del padre Ruggiero al nostro reverendo padre generale Claudio Acquaviva generale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ARSI, *Jap.Sin.*, 101 I, f. 8.

⑤ 楊福綿:《羅明堅與利瑪竇的〈葡漢辭典〉(歷史語言導論)》,載魏若望(John W. Witek)主編:《葡漢詞典》,2001年,第106~108、184頁;Albert Chan(陳綸緒),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

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New York: M.E. Sharpe, 2002, p. 255.

⑥ 根據葡文以及羅馬字注音,其對應中文當為“驢叫”和“耳朵響”。

⑦ ARSI, *Jap.Sin.*, I 198, f. 1.

⑧ Pasquale M. D'Elia, "Il primo dizionario europeo-cinese e la fonetizzazione italiana del cinese", in *Atti del XI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gli orientalisti*, Roma 1938, pp. 172-178;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 1579-1615*, edite e commentate da Pasquale M. D'Elia,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1942-1949, II, p. 32, n. 1.

⑨ Fumien Yang P., *The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of Matteo Ricci. A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6. Joseph Abraham Levi 也將該詞典視為利瑪竇的作品,Joseph Abraham Levi, *O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de Padre Matteo Ricci, S. J. (1552-1610), Uma abordagem historico-linguistico*,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South, Inc. New Orleans, 1998.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魏若望主編:《葡漢詞典》,第106頁;第89頁;第110頁;第88頁;第89頁;第134頁。

⑪Luís Filipe Barreto, “A Dinâmica Cultural de Macau, c.1560-c.1660”, I Parte: *A Fronteira Cultural in Macau*, II Série-nº 58, 1997, pp. 42-56.

⑬Luís Filipe Barreto, Reseña de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de John W. Witek (ed.), in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nº5, december 2002, pp. 117-126.

⑭王慧宇:《從中西文化交流視野看羅明堅“葡漢辭典”中概念的詮釋翻譯》,北京:《勵耘語言學刊》,2019年第1期。

⑮Fonti Ricciane, II, Tavola V.

⑯Fernando Bortone 包志仁, *P. Matteo Ricci S. I., il “Saggio D’Occidente”, Un grande Italiano nella Cina Impenetrabile (1552-1610)*, Roma, 1965, p. 270.

⑰Joseph Abraham Levi, *O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de Padre Matteo Ricci, S. J. (1552-1610), Uma abordagem historico-linguístico*, p. 26.

⑲ARSI, *Jap.Sin.*, I, 58a, f. 1; f. 39v.

⑳姚小平:《明末〈葡漢辭典〉的漢字》,北京:《中國語文》,2015年第2期,注1。

㉑*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edite a cura del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I., Macerata: stab. tip. F. Giorgetti, 1913, II, p. 411; *Fonti Ricciane*, I, pp. 154-155.

㉒ARSI, *Jap.Sin.*, I, 58a, f. 14v; ff. 24-24v. 關於雙語《千字文》中國合作者的考證,參見宋黎明:《羅明堅拉丁文注音並翻譯的〈千字文〉研究》,北京:《國際漢學》,2022年第4期。

㉓關於第二欄上兩組非羅明堅書寫的羅馬字注音,即 sunue 和 Tianciusunwanue,王銘宇認為係“西人後來添加”(《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詞彙問題舉隅》),但筆者發現其筆跡與羅明堅《中國圖志》中《南京圖(Nanchin)》和《遼東圖(Liautum)》(Eugenio Lo Sardo, ed., *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 S. I.*, Roma, 1993, T. 63, T. 77)的筆跡吻合,書寫者當為 Phelipe Méndez。

㉔Michele Ruggieri, *Relatione del successo della missione della Cina del mese di Novembre 1577 sino all’anno 1591 del padre Ruggiero al nostro reverendo padre generale Claudio Acquaviva generale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ARSI, *Jap.Sin.*, 101 I, f. 49. 1590年7月在羅馬與羅明堅見面的羅西(Pietro Paolo Rossi)神父在一封

書信中證實,羅明堅返回歐洲時攜帶了一位中國人;參見謝明光:《從新發現文獻再探羅明堅及其在華傳教》,北京:《國際漢學》,2020年第4期。

㉕ARSI, *Jap.Sin.*, II, 161, ff. 1-60. 張西平通過《尺牘指南》的內容和原始裝幀而得出結論:“該文獻應歸屬於羅明堅”;張西平:《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51~52頁。

㉖ARSI, *Jap.Sin.*, II, 162, ff. 1-28.

㉗Matteo Ricci, *Lettere, 1580-1609*, Macerata: Quodlibet 2001, p. 86.

㉘Raoul Zamponi 認為《葡漢詞典》完成的時間很可能是1583年6月19日,而利瑪竇則為唯一作者;Raoul Zamponi, “Per una nuova immagine del dizionario portoghese-cinese attribuito a Ricci e Ruggieri”, in *Humanitas: attualità di Matteo Ricci: testi, fortuna, interpretazioni*, Macerata, Quodlibet, 2011, pp. 81-85.

㉙ARSI, *Jap.Sin.*, I, 58a, ff. 9-9v; ff. 24-24v.

㉚ARSI, *Jap.Sin.*, 9 I, f. 58 v; f. 59v.

㉛ARSI, *Goa*, 12 II, ff. 532; Iosephus Wicki, ed., *Documenta Indica II (1550-1553)*, f. 532; Michele Ruggieri, *Relazione*, ff. 11v-12.

㉜ARSI, *Jap.Sin.*, 9 I, f. 51v.

㉝*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 II, p. 401.

㉞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p. 254;魏若望主編:《葡漢詞典》,第88頁。

㉟ARSI, *Goa*, 12 II, ff. 532-533v.

㊱Fonti Ricciane, I, p. 155.

㊲ARSI, *Jap.Sin.*, 101, I, f. 115.

㊳龍華民在1598年10月18日的信中表示,他在中國修士的幫助下學習漢語,輔以“利瑪竇神父翻譯的《四書》拉丁文譯本”(una versione latina del *Suxu*, ...quale fece il P. Matteo Ricci), ARSI, *Jap.Sin.*, 13 I, f. 177.

作者簡介:宋黎明,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講座教授。南京 210023

[責任編輯 陳志雄]